

绪 论

在中国思想史的丰富库存中，筛选整理出有关“社会”的理论学说，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社会学家而言，都是一项艰难的拓荒工作。这不但是指那些对于所有研究工作来说都必须付出的艰苦努力，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定义的多样性，使我们在如山的资料面前，无从给“社会学说”划定一个清晰的、有说服力的界限。另外，我们还不得不考虑，在清理和分类时，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地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打捞出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一、“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界定

应该首先声明，“中国社会学说史”更经常地被人们称作“中国社会思想史”，我们之所以称其为“中国社会学说史”，是因为它能更准确地反映它所涵盖的学科内容。“社会思想”一词被用得太过滥了。它很容易让人想起由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学、哲学等思想组成的大杂烩——思想通史。实际上，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专门的“社会”思想，而非包罗万象的“社会思想”。

因此，只有运用“中国社会学说史”的名称，才能清楚地标明它的社会学特点

社会学说史是介于社会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研究的是历史上有关“社会”的思想学说、理论规范，它是普通思想史的一部分。社会学说史同经济学说史、政治学说史、法律学说史及教育学说史的关系，正如同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及教育学的关系。

“社会学说史”和“社会学学说史”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后者又被称为社会学思想史或社会学史在西方，它既是指自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各家各派有关社会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建树，又指思想家自觉地以系统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通过对社会本身的研究而提出的思想学说。社会学说史是当今的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重新整理的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对“社会”的思想见解，而社会学学说史研究的则是社会学诞生以来，社会学家们对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贡献以及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对社会所作的探讨分析。

社会学说史能够一直写到现在。因为即使是社会学诞生以后，许多重大的社会理论仍是由非社会学家提出的。而社会学学说史只能包括那些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对于社会人生所作的理论思考，以及非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作指导，所完成的对社会的理论研究。由与社会学全然不相干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提出的社会理论学说，不应包括进社会学学说史的范围。

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社会学学说史是简单的，因为社会学自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没能顺利发展，不但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学科的建树十分有限，而且能够运用社会学的论方法来研究现实社会的非社会学家也屈指可数。以至当二十多年前社会学的研究再次恢复的时候，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还不知

道社会学究竟为何物。因此，中国近现代许多重要的“社会”思想，是由那些差不多对社会学完全缺乏了解的理论家、政治家提出的，这些“社会思想”是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研究内容

关于社会思想，社会学家们已经作了种种讨论，或者认为是关于人类团体生活的思想，或者认为是人对其同类生活所产生的观念，也有人认为社会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思想。龙冠海博士综合了各家意见，写道：“凡是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的思想，都可称为社会思想，但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内容浩繁，不一而足。论其主要方面，则包括社会的起源与变迁、社会组织与功能、社会问题等等。”^①

那么，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关于社会、个人、群体以及社会生活的思想见解、理论学说。

二、中国社会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

思想的历史不能离开实际的社会生活，它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于此，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规定，而且也成为了一种经典的方法，被自称为唯物主义的学者广泛地运用于各种思

① 龙冠海、张承汉：《社会思想史》，台北：民书局 1979 年版，第 1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74 页

想史的研究。

这种经典的方法是否已经尽善尽美？它能否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的根本指导？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从最终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任何思想的产生、发展都不能离开实际的物质的社会生活。但是，反过来看，所有的人类的物质生活，必然是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而组织并实施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已经远远超出了动物界的简单行为。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方法论，它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并非每一点都能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找到它的对应物。

所以，对于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研究来说，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的这种方法，可以作为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继续给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中国社会学说史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去追究每一位思想家、每一种理论的最终来源，而是试图展示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的思考和解释。它关心的是理论本身，而不是它的来源。我们研究孔子的社会学说，主要兴趣在于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论见解及其影响。至于它是如何产生的，对我们来讲并不重要。况且，弄清孔子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情况，要比弄清他的思想，还要困难。

阶级分析通常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另—重大方法，但对于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研究来说，它却很难施展它的效力。阶级的划分标准是物质的经济状况，而社会学说史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思想理论，如上所述，要在二者之间寻找相互的对应，是困难的；给思想家贴上某个阶级的标签，往往会使我们对思想理论的研究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于肤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虽有阶级的分化，但中国有名望的思想家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无论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也无论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这些思想家们的理论研究，其目的差不多都是为了给统治者出谋划策，这同时也就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社会中的被统治者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社会，从事理论的探讨。他们虽然在物质上支持着整个社会的生存，但在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及发展速率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却发挥着关键作用。个别思想家虽然对当权的统治者持不合作态度，甚至成为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但过激的态度常使他们由反对当权者转而反对整个社会，乃至所有的人类文明，因此他们也没能对中国社会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距今稍近的一段时期，作为被统治者的农民阶级，在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中，虽然提出过一些社会见解，但这些观点往往十分幼稚，难以操作实施，他们不可能在一个较广的范围里建起全新的社会秩序。即便是太平天国比较系统的社会纲领，也没能超出传统思想的窠臼；义和团的社会主张当中，更有许多与社会进步的法则直接相背。可以理解的是，农民的反抗差不多完全是一种图生存的斗争，虽然在某些历史的转折时期他们有可能暂时充当革命者的角色，但从根本上说，从他们自身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综合素质看，他们无力提出“革命的”社会理论，铺设新的社会发展轨道。

阶级分析法常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使我们难以达到最终的研究目的。即使在看起来阶级阵线比较分明的 20 世纪前半期，要想给某种理论、某个思想家贴上一个符合实际的阶级标签，依然十分困难。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学说的主流，是由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推出的。在此情况下，仍以阶级为纲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说史，实在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被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所信奉、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虽然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定，但在这里，我们认为它主要的内涵应是：全面、客观和公正；去除切非历史的东西；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及其社会学说的本来面目。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学家们一样，社会学家必须尽力在研究中作出公正的、不受感情和偏见影响的结论，并客观地表达他们的种种发现。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精密和科学的知识体系。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来说，这个体系是客观的和公正的；而对于今天和将来的中国社会与思想状况，它又具有巨大的解释力。

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或理论模式，虽然产生于经验性的历史资料之中，但它却力图超越这些资料并建立起抽象的概念、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体系。因为在社会学说史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从未想到过的那些要素和线索，往往只有通过符合逻辑的理论化才得以产生。这种方法的本质特征，就是用系统分析方法取代叙事式的简单描述。

运用这种系统的分析技术，必须扬弃传统的考据式的研究方法。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集中精力于文字的细节探究。表面看来，为一个字、一句话的来龙去脉作洋洋洒洒几万言的考释，这是最精确的研究方法，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精确性完全是虚假的。虽然精确的考据，详细的注疏、证笺能帮助增强我们的理解力，但如果把对一个思想家理论观点的把握仅仅维系于片言只语的考释，则未免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明白这点，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学说史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中国的

图书文献，多有错漏，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学说的总体把握。

系统的分析方法还要求避免对社会学说作简单化处理。研究某位思想家的社会学说，必须同时考察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状况、文明发展程度以及整个文化潮流；个人的生活经验；社会学说的内在逻辑体系；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与同时代其他地区思想相比所显露出的特殊性质等。这种方法有能力把那些杂乱无章的资料组织起来，并从复杂的历史因素中抽象出至少是相对稳定的理论模式，并使其具有科学的意义。与此相比，仅仅运用单一的阶级观点、经济基础或者文字考据来解释和组织思想家们的理论成果，容易出现对一个完整体系的肢解和偏见。再则，我们在资料的使用上，既要研究那些由官方或民间记录整理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也应充分注意那些地下出土或地上残存的非文字的历史遗留。对于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研究范围来说，既要研究由官方所推崇、被众多典籍记录下来的正统社会理论，又要研究那些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却仍在民间广泛流行，时刻影响着普通人生活的非正统思潮。即，既要研究雅文化，又应注意俗文化；既要研究大规模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学说，也不能忽略作为历史支流的小规模社团中的社会观念。

当然，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要达到科学、全面、客观和公正，并非轻而易举。首先是因为大量的文字资料，被统治者重新删改编修过。出于王朝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出于保持现有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他们极力抹杀、掩盖社会学说中的分裂、分歧和变异。“异端邪说”被人为地忽略了。其次，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生活在当代，接受的是现代化知识体系，况且，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又有所不同，这样必然会影响到材料的选择运用甚至最后的研究成果。但是，如

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忠实于真理的天性、高度的思想诚实，凭着一个学者的睿智，充分地利用系统分析技术，尽力搜寻每一个可能的历史线索，构造出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精密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明一点，中国社会学说史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出于好奇，展览死人给活人看，或者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希望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并寻找现代中国社会学说、社会学理论的来源，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甚至未来的中国社会。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作是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亦即为了今天，我们必须重视过去。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最根本的宗旨和指导原则。

三、中国社会学说史的分期

探讨中国社会学说史的历史分期，必须打破现有的一切成见，从一个更广泛的范围，考察中国社会的演变。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并不仅仅是政治，更主要的应是整个社会机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文化思潮等。在作了这样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说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上古（公元前 551 年以前）；古代（公元前 551 年～公元 960 年）；中世纪（960～1840 年）；近代（1840～1919 年）。

（一）上古时期。把中国社会学说史上古时期的结束点定在孔子诞生的公元前 551 年，是因为在孔子以前，中国社会学说零乱而贫乏。图腾、天、帝、祖先、卜筮、巫术和宗教观念，都没被系统地思考过。在那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不但没有任何一位留下著作的社会思想家，而且也没有任何一条可称之为理论或学说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模糊的观念，一些根据简单的思维能力对外界所作的推测和设想。今天我们要想对此加以研究，只能

依靠一些其可靠性经常受到怀疑的神话传说，以及残缺不全的出土文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及其《论语》的出现的确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说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另外，孔子出生前后，铁器开始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中国的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中国的农业社会，正是从此开始的。

（二）古代时期。从孔子诞生到宋朝建立之间的 1500 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生气也最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此期间，中国人显示出了他们天才的创造力。思想家们创立了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并怀抱各自的理想，试图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施加影响；开明的政治家，也以积极的姿态，宏大的气魄，接受了各种各样包括来自西方的社会学说。这样一个时代所作出的理论建树，远远超过了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古希腊时代的贡献。

先秦只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儒墨法诸子百家掀起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浪潮，这些生机勃勃的思想浪潮并未被秦始皇的铁腕统治所切断。在秦之后的岁月中，佛教学说、玄学理论作为独立的思想支流，伴着层层波澜，加入到了主干的中国思想之流。在 1500 年的流转冲撞中，有些理论被淘汰，有些被改变，但无论如何，这股潮流的形式，它的生命力，却一直保持着自身的连续和统一。先秦诸子学说的提出，汉代的争吵，佛教的进入，魏晋玄学的不甘寂寞，大唐一代的自由空气，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世纪。公元 960 年大宋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中世纪的开始。在唐末宋初近 200 年的时间里，中国农业社会的整个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标志便是中央集权政治的成熟和各种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

最能标明中世纪特征的，是公元 960 年到 1840 年间中国社会思想理论界的沉默和无所作为。在这期间，张载、朱熹、王

明为代表的理学占了统治地位。理学总结了古代各种社会思潮，并对其作了创造性转化，使生机盎然的古代思想理论演变成一种禁欲主义的准宗教性的社会学说。政教合一的中国社会日趋僵化、虚伪和腐朽，思想家们失去了创造的自由，放弃了雄心勃勃的理想，抛开了宏观社会体制的论争，转事于微观社会学的精雕细刻，理论园地显得一片荒凉。虽然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给中世纪的中国社会学说带来了新鲜空气，但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漫长的将近 1000 年的中世纪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四）近代时期。中国思想史上的近代开始于公元 1840 年，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公论。问题是它结束于 1919 年还是 1949 年，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

近代社会的开始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外在标志的，世界历史的近代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的废墟上，在欧洲和日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准现代化社会；在美国，这个社会叫“后工业社会”或“超工业社会”。根据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计算，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在美国大约开始于 1955 年以后的十年间。在这十年间，白领工人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而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部门。近代社会结束的标志是工业化的最终完成，或者，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社会机制的出现。

十分明显，1919 年的中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时期，而 1949 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是 1949 年开始的，虽然到 1976 年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有迹象表明，1976 年后的中国已开始朝现代化迈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的现代化也许从此时才真正开始。

从社会学说史上考察，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社会理论创见，首开中国近代思想学说的先河；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面推进了近代社会观念的启蒙过程。以科学民主反愚昧专制，以资本主义对抗封建主义，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都是近代的观念。1949年后的各种社会学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观念，都未能超越近代的樊篱；甚至在某一个时期，许多封建的社会观念在中国横行无阻。

近代中国社会学说是丰富的。思想家们再一次显示了卓越的才干，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宏观社会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关于应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社会体制的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学说澎湃激荡，而社会主义则最终脱颖而出，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无疑，这是中国社会学说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以专门研究“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已经传入中国，虽然它的能力一直没有得到正常施展。

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中国，外部的现代观念正渗入我们的生活，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在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社会理论，但系统的现代中国社会学说的形成，还必须足够的时间。我们耐心地期待着这一天。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兴起

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

一、鸿篇巨制

由于厌烦了看那些猿类如何逐渐演变成人的图片，伊夫·科庞（法国最有名的古生物学家）产生了著书总结人类起源这一棘手问题的想法。他与他的长期搭档——法兰西学院的帕斯卡尔·皮克一起召集了欧洲最好的科学家（其中多数是法国人），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研究人类、人类的祖先（从狐猴亚目动物到南方古猿）和人类的近亲（猩猩）方面，人们最近已经有了一些新发现，上述科学家为这些新发现作出了贡献。26名专家（古生物学家、生物学家、灵长目动物学家、动物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完成一部鸿篇巨制，用1200页的篇幅描述那段非凡的历史——生命在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这个星球上的诞生过程。据科庞说：“人类可能不是地球上曾发生过的一场大灾难的唯一幸存者，但却是最后的幸存者。”

从38亿年前原始海洋里出现第一批细菌到今天，并无直线可循，就像《圣经》里描述的国王家谱那样，而是存在许多派系和不知原因的演变。在书的第一章，进化论专家让-雅克·耶热写道：“生命的历史就像一把随着生物变革和灭绝而开合的扇子。”我们被迫去思考几百万年前的事情。气候变化，陆地和海

洋移动，物种繁殖、增多、分门别类，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甚至恐龙族动物灭绝（这使我们的祖先——哺乳动物有了占领地球的机会）的原因也不清楚。这充分说明，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持谦虚态度，同时也必须表现出创造精神。

人们对现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所有进化感到十分惊讶：第一批海洋生物的甲壳的形成，随后是骨骼的形成；呼吸方式和运动方式的改变以脱离海洋到陆地上生活；有性生殖方式（需要更多能量，但却能够“混合”各种基因和染色体）的出现给了每个生物一份与众不同的遗产。当然，也有一些失败。但不管怎样，进化（这个革命性的概念是达尔文在 19 世纪中叶提出的）仍在继续。

二、人与猿的亲缘关系

达尔文让他同时代的人感到震惊，这与其说是由于他向人们分析了这种进化的机制，还不如说是由于他揭示了人与猿之间的亲缘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发现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分析新发现的化石，破译灵长目动物的基因和观察猿类的行为与动作，都可以证明人类与猿之间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有待确定的是各个物种选择不同的进化道路的时期。第三纪（约 6000 万年前）是关键时期之一。当时气候酷热，地球上覆盖着森林，到处都是开花、结果的植物。作为当时“森林的主人”的灵长目动物在这种具有保护性的、食物丰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灵长目动物的一个分支——猿（曾被布丰称为“人类的骗人面具”）突显出来。到了约公元前 2500 万年，类人猿从其他猿类动物中分离出来。它们的头颅和手已经与我们的头颅和手差不多了。

但又过了几百万年之后，类人猿才确定了自己与其他猿类动物的不同之处。伊夫·科庞认为关键的时候是公元前 800 万年前

右，当时大裂谷将热带非洲与干燥的稀树草原地带分隔开来了。在高高的草丛中间，南方古猿改变了它们的生活习惯以抵御捕食性动物。它们被迫站起身来用双脚走路。对狮子的恐惧使它们成了两足动物。普瓦捷大学古生物学实验室的米歇尔·布律内认为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他在乍得的一块以前长满树木的土地上发现了一只南方古猿（被起名为“阿贝尔”）的牙齿。之后，人们又在其他不同类型的土地上发现了同一时期的其他化石。

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之所以那么激烈，首先是因为人类古生物学在不断发展。20年前进行的基因分析使人们更好地划定了人类从猿类中分离出来的时间：公元前800万年～公元前500万年。任何新的化石发现（特别是2001年布里吉特·塞尼和马丁·皮克福德发现的“图根原始人”——Orrorin化石）都会扰乱人与猿的系谱树，迫使科学家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是颌骨的形状还是脑的大小？是两足形态还是饮食习惯？是制造工具的能力还是表现出的初步文化征兆？^①

三、人类起源的非洲说和亚洲说

现今的人类已经能够到月球散步，邀嫦娥喝杯冷饮，可迄今为止他们仍不能确认自己最早的祖先生息在哪里。100多年前，查尔斯·达尔文以他惊人的勇气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表面的平静，指出人类是现生猿猴的表亲，现存灵长类中最接近人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生存在非洲，因此，他认为人类发祥地也可能在非洲。近年来在东非发现的大量比原人更早的猿人（南方古猿）阶段的骨化石和石器，又为达尔文增添了新论据。

1891年，荷兰军医杜布瓦为找到人猿之间“缺环”的化石，

^① 参见《人类的起源》，载2001年11月8日法国《快报周刊》

出发到了爪哇。在爪哇特立尼耳，杜布瓦发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一种原始古人类的化石，包括一个头骨的顶部、一些牙齿和一根股骨。在杜布瓦看来，这种古人类化石的特征，部分是猿的而部分是人的。当时的科学界嘲笑了杜布瓦的发现，认为它们不属于人类系统。到 20 世纪 30 年代，特别是凯尼格斯韦德在爪哇桑吉兰早期上新世地层中发现其他直立人化石时，科学家才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这两个发现是一种全新的早期人类遗存^①。这种被认为最早的人类即原人（直立人）阶段的骨化石的陆续发现，使人们相信在亚洲也生息过诸如猩猩、长臂猿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加之从地球上看来，亚洲又正是处于人类生息的世界各大陆的中心位置，所以又有人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

四、人类进化结束了吗？

对于那些梦想更高生活质量的人来说，科学给他们带来了坏消息：现在已经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质量了。我们这个物种已经达到了生物进化的巅峰，不可能再有变化了。

这就是一些生物学家所持的坦率但是引起争议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现在的生活方式能保持人类免受曾经对智人产生影响的那些力量的影响。

（一）自然选择是根

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举行的题为《进化是否已终结》的辩论中，伦敦大学学院的史蒂夫·琼斯教授提出了他的论点：“如果你想知道乌托邦是什么样子，只要看看周围——这就是乌托邦。人类的进化已经停止，既不会变好也不会变坏。”

然而人们对这种看法存在争议。其他科学家认为，人类仍然

^①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9 页

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是这种力量在过去的 30 亿年中创造了地球上的无数物种。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教授说：“如果你看到过仅 5 万年前的欧洲石器时代的人，你会认为人类会一直朝着越来越壮硕的方向进化。后来，来自非洲的轻盈、高挑、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突然之间取代了他们并掌管了整个世界。你根本无法预料到这样的进化事件。有谁知道人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有些科学家认为人类智力正在下降而且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另一些科学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人类的智力将越来越高，但是健壮程度越来越差；还有一些科学家——例如琼斯等人——认为有证据表明人类进化已经停滞。上述三种论点的依据都是自然选择理论。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个性寿命较长，后代也比较多，因此它们的基因就会在自己的群体中传承，这就形成了进化性改变。例如，脖子较长的有蹄动物能够吃到高树上的嫩枝嫩叶，因此与同类相比更容易吃得好、活得长、有更多的后代。最终，它们进化成了长颈鹿。那些短脖子的同类就灭绝了。

（二）进化阻力种种

人类的进化过程与此类似，但是现在这一过程停止了，因为每个人——不仅仅是最能适应环境的人——都能把基因传给下一代。

此外，人类人口中如今经常出现的异族通婚也对进化造成了阻碍。现在，人们在大学和学院里与来自其他大洲的人相遇并结婚；而我们的上一代人却很少与自己所在城市以外的人婚配。因此，我们基因的融合会很快产生一个相同的棕色皮肤的人群。除此之外，人种将鲜有改变。

然而，这种观点所涉及的只是西方世界，因为西方的食物、

卫生和医学发展几乎能够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下去并传宗接代。发展中世界则不具备上述条件。琼斯说：“只要看一下艾滋病和黑猩猩的例子，你就会发现每只黑猩猩都带有某种类型的艾滋病病毒，但是却不受这种病毒的影响。”

但是在几千年前，当第一批黑猩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情况可能完全不同。随着病毒在它们中间传播，很可能有千百方只黑猩猩死去了，只有少数带有对艾滋病病毒有免疫力的基因的黑猩猩幸存了下来，成了现在所有黑猩猩的祖先。

（三）智力推动进化

“人类不久可能会发生非常类似的情形。1000 年之后，将只有今天对艾滋病病毒具有免疫力的少数人的后代生活在非洲。他们的体内将携带艾滋病病毒但是不受影响。因此，不错，变化还会发生——但是仅限于在进化力没有受到抑制的地区。”

然而，其他科学家认为，尽管得到西方生活水平的保护，进化压力依然对人类存在影响。例如，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威尔斯认为，思想正在推动我们的进化。他说：“人们重视思维的敏捷和拢聚财富的能力。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多的后代，也往往活得比较长久。”换言之，智力——我们这个物种的定义特征——仍然在推动我们的进化。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波得·沃德反对这种观点。沃德还在他的《未来的进化》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生活使人们不再受到进化的影响。“我认为我们不再会看到任何变化——除非人类自己有意制造变化：我们开始用生物技术来改造人，在人体内植入使人更长寿或更强健的基因。”

他说，如果人们能够活到 150 岁，生育期超过 100 年，效果将是戏剧性的。“人的一生中能够生育几十个孩子，这无疑会使人类的进化产生偏移。这样的人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拢聚财富。”